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曹道衡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曹道衡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 曹道衡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35-1

I. ①南…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187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本书据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曹道衡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135-1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1/2

定价: 105.00 元



曹道衡

(1928—2005)

論齊梁文學

曹道衡

历来谈论文学史的人一提起“齐梁文学”，往往就想到声律、对仗或骈四俪六的问题。这些形式和技巧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齐梁时代的文坛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作家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论对文学的题材或艺术形式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在这里我想就个人的一些认识，谈些初步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

南朝的版图和政权都继自东晋，东晋的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中原士族所建立的流亡政权。这些中原士族，凭借西晋初年平定孙吴的余威，在统一之初就轻视吴人。早在西晋覆亡前夕，葛洪

作者手迹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南北文风异同说的提出	3
第二节 关于南北文风差别的时间断限	11
第三节 怎样看待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	16
第四节 对北朝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	21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28
第一节 统一的中华文明之形成	28
第二节 大一统时代的地区差别	35
第三节 从汉至西晋的几个不同地区文化状况	45
第三章 汉魏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南北文风	58
第一节 儒学的独尊与“今文经学”的兴衰	58
第二节 “古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局限	65
第三节 儒学的“衰微”和玄谈的兴起	76
第四节 玄学的兴起及其与地域的关系	82
第四章 南方的文化传统	90
第一节 南方的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	90
第二节 南方的发展与士族的形成	96
第三节 南方的儒学	102
第四节 江南的道教和佛教	110

第五节	三国西晋南方文学的发展	120
第五章	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	127
第一节	门阀士族的变迁	127
第二节	南朝士族的内部矛盾	133
第三节	南朝士人的生活方式	138
第四节	建康——南方文化的中心	146
第五节	南朝文风向各地的传播	153
第六章	南方文学的几个主要题材	163
第一节	玄言诗和玄谈的影响	163
第二节	山水诗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	175
第三节	“永明体”的产生及其作用	180
第四节	“新变”和“宫体诗”	183
第七章	河朔的文化传统	187
第一节	河朔的地理环境和民风	187
第二节	河朔文化的兴起	195
第三节	凉州文化的影响	204
第四节	南方文化对北朝的影响	207
第八章	北方的生活情况及文化的衰落	212
第一节	“五胡乱华”的性质	213
第二节	十六国北朝人们生活的特殊方式	221
第三节	北朝的学术和宗教	228
第四节	北朝前朝士人生活状况对文学的影响	238
第九章	孝文帝迁洛与北朝文学的兴起	243
第一节	鲜卑拓跋氏汉化的历程	243
第二节	汉化和迁洛所引起的新矛盾	247

第三节 北齐文学与北周文学的不同	259
第十章 北朝文学的特点和得失	266
第一节 北朝文学的特点	267
第二节 北朝文学的长处和短处	272
结束语	282
后 记	289
曹道衡先生学术年表	298
曹道衡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傅刚 蔡丹君 309

第一章 绪论

南北文风的异同是历来研究南北朝文学史的人早已注意到的老问题。但是,在从来的文学作品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中,所着重选录和论述的,大抵仅仅限于南朝的作家和作品,涉及的北朝作品甚少,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乐府民歌和极少数几篇骈体应用文和为数更为式微的文人诗,与同时的南方作家作品相比,几乎还不到十分之一^①。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当时北方作家和作品存留者本来很少,好作品也确属罕见,因此不受后人的重视也不足怪。我们试看《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北朝魏、齐、周三代人的文集,其数量就远不足与南朝相比,甚至其总和还不如南朝四代中存书最少的陈代,这就很清楚了。这种情况,似乎并不限于文集,同样地像传统所分的“经”、“史”、“子”三部分典籍,情况和“集部”也没有多大区别;特别像“经部”,其悬殊程度尤为突出。这一切是不是说明北朝的文化远不如南朝发达呢?如果是这样,又由于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很有探讨的必要。因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籍,大抵是隋代统一中国以后,把北方旧藏的图书和收缴到南朝所存的藏书以及在民间搜集起来的书一起藏于洛阳。其中北朝藏书中,隋的代周是出于宫廷政变,根本没有在京城

^① 这样说当然不包括由南入北的某些作家如庾信、王褒和颜之推等。

长安动用武力,自然谈不上什么破坏;周的灭北齐,其实也是势如破竹,在齐都邺城未遭抵抗,也不会对图籍有什么损毁。至于南朝的藏书,情况就不同了。根据《隋书·牛弘传》所载牛弘上表隋文帝建议广收典籍的奏疏中说,北朝的国家藏书,本来很不丰富,比南朝相差甚远。南朝的藏书经晋、宋、齐直到梁代,其藏书数量相当可观。所以《隋书·经籍志》中经常说:某书若干卷;又注云:梁若干卷。其中梁代卷数远多于隋时所存卷数。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集》,梁代有10卷,到隋时只存3卷;《应玚集》梁代有5卷,隋代只存1卷;晋代《左思集》,梁代有5卷,隋代只存2卷;《陆机集》,梁代有47卷,隋代只存14卷。其他作家的集子,梁代尚存而隋代已佚的为数也很多,“经”、“史”各部的情况也大致相类似。我们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梁代末年图书经历了两场浩劫:一次是“侯景之乱”和梁将王僧辩平乱时的战火,焚毁了建康宫殿中的不少藏书;一次则是王僧辩把残余的部分送到了江陵,梁元帝萧绎曾命庾信、颜之推等人加以整理,但不久又因西魏军攻克江陵,萧绎在被俘杀的前夕放火烧毁藏书,以致受到了更惨重的损毁。这样,隋代的藏书就比梁代要少得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还由于北朝各代的鲜卑族统治者对典籍的收藏很少关心过,除了魏孝文帝以外,前此的献文帝以前各朝和后此那些出身“六镇”军阀的北齐、北周统治者也是这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朝文化不如南朝发达的一种表现。但一个时代的文化兴衰,并不完全决定于几个帝王的意志,如果据此笼统地断言北朝文化落后,恐也不完全确当。因为迄今所见北朝的书法、雕塑等等都有其不同于南朝的特色。北朝学者所作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齐民要术》,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说明北朝统治者虽大多不

重视学术和文化,而私家的著述还是存在,也未必没有人进行过文学创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因为后来的学者和文人在搜集、整理和使用这些图书时,可能还存在有“重南轻北”的偏向,这很值得研究。因为像唐初孔颖达所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所采的说法大抵出于南朝学者,而对北朝人的学说所取甚少。其实像北周的经学家熊安生卒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下距隋文帝代周不过三四年光景,他关于《周礼》、《礼记》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就不见著录,贾公彦作《正义》也未加采择。至于文学方面,保存作品较多的类书《艺文类聚》,成于南方人欧阳询之手,其所收主要为南人之作,更不足怪。甚至出身弘农杨氏的作家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批评当时一些文人说:“好异之徒,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孔颖达和杨炯都是北方人,尚且这样对待北方的学术文化,这就关系到一个时代的风气的背景了。不过,从杨炯的话看来,他虽然不赞成“河朔之制”,却也承认“河朔”文风与“江南”存在着不同。这个问题似可进一步探讨。在这里,笔者想试图从现有材料提出一些看法,来分析南北文风不同的原因。

第一节 南北文风异同说的提出

南北朝时代南北文风有别的说法,是古人早已指出了的。较早地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隋书·文学传序》,原文云: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辘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主持《隋书》修撰工作的是唐初魏征,他出身于北方士族,却又兼擅诗歌和应用文字。他在叙述南北文风时,既要符合于南北文学发展的实况,又不得不考虑到北魏中期以前在文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作家作品的事实而使北方士族太失体面,因此这段叙述不能不从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开始大力推行汉化后说起。所以他对自汉迄刘宋的文学情况只能轻轻地一笔带过,说到南朝文学,也只从江淹、沈约和任昉讲起,连卒于南齐时的谢朓、王融等人也没有提到。他这样做,也有其理由。因为《隋书》的修撰是在唐初,而南朝诸史中,《宋书》成于齐梁间的沈约,《南齐书》成于梁代的萧子显,北朝诸史中《魏书》成于北齐的魏收,都在唐以前;至于南朝的《梁书》和《陈书》、北朝的《北齐书》和《周书》则也都成于唐初,和《隋书》差不多是同时修撰的。这样做可以避免和前人的重复,却又避开了北魏中期以前文学衰微的阶段。然而这只能在文字上给人一个南北并重的印象,还是避免不了问题的实质。

因为北方自从西晋灭亡以后起,由于各族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中心,再加上汉族士大夫与各族军阀间的心理隔阂,由战乱频繁所造成的村居生活等等复杂的情况,纵使有人想致力于文学创作,也往往受到诸如典籍缺乏、交流困难等等的限制,很难使其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提高。而且即使这些村居的士大夫中确实产生了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会因为缺乏交往和传播,只能藏在家中,而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条件下,私家藏书更易在兵火中散失。即使未遭兵火,也会由于后人的不加珍惜而丢失。如《魏书·崔玄伯(宏)传》:“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这首诗究竟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这很难说,但它毕竟还是保存不下来,说明在北朝,作品的保存是何等不易。所以从十六国时代一直到魏孝文帝以前,各种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几乎寥若晨星。由于缺乏传统的凭借和参照,即使在北朝后期,文学创作已初步兴起之后,还是很难和南朝相抗衡。这一点,北齐魏收在《魏书·文苑传论》中就丝毫不否认这事实,他认为在北魏之末,尽管“文雅大盛”,仍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过,数量和质量之间总是有着辩证的关系,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多起来,又有了像洛阳和后来的邺城这样的文化中心,也就使文学发展和提高的条件大为改善。据唐代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空海在《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引隋人刘善经的话说:“从此以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从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段话对北朝后期文学的成就似乎有些夸大,认为“海内莫之